「猴與馬」造型母題：
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

邢義田*

【摘要】歐亞草原上善於養馬的游牧民族和華夏農業社會在接觸的過程裡，曾將和養馬相關的技術和信仰帶入中原。他們普遍相信猴有防止馬牛羊疫病的能力。出土資料證明戰國時代的中原工匠很可能已開始為草原游牧民族製造寓有這樣意義的銅飾。這樣的造型母題進入中原以後，有些保持了大體相似的造型特色和寓意，有些則發生了像山東畫像石上那樣的造型和寓意上的變化，而具有「馬上封侯」的意義。寓馬上封侯之意的裝飾也可能因華夏工匠的製作，回傳草原社會，而為遊牧民族所接受。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互動過程，情形到底如何？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馬上封侯、鄂爾多斯青銅垂飾、漢代畫像、猴防馬疫

關於解讀漢代畫像寓意的方法，我曾一再提到榜題的重要。如果沒有榜題，是不是就無法解讀了呢？說起來，漢畫像沒有榜題比有榜題的要多得多，這是研究漢畫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承認某些母題會跨越時空而存在，解索畫意的一條路似乎是追索不同時空下類似的母題，上溯或下推。母題的表現和意義因時因地雖會變化，卻也可能留下可以辨識的痕跡和線索。也就是說，在魏晉隋唐或宋元明清，或在中原地區以外的造型藝術中，如果辨認出某些母題的造型特徵和意義，那麼就有可能順著持續存在的痕跡或線索推溯出某些漢代畫像或造型藝術母題的特徵和意義。

這樣推溯，缺乏直接證據，危險性十分明顯。幸好，中國傳統造型藝術，尤其是工匠所製的工藝品，不論是造型特色、表現手法或寓意都有相當頑強的延續性。這和中國社會文化幾千年來其它方面強烈的延續性，可以說互為表裡。因為延續性強烈，得以稍減回推方法上的危險。本文要討論的一個具體例子，就是漢代石刻畫像和陶、銅、木器上的猴與馬造型母題。這個母題表現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形式不盡相同，寓意也多重多樣，卻延續長達兩千年。

我注意到猴與馬這個母題，約在16年前。1992年3月10日參觀滕州市博物館，無意中見到一方漢代石刻畫像。在一樹下，有一人立於馬上，作仰首攀樹枝狀，其旁有一人仰首彎弓正在射樹上的鳥雀，另一人立於射手與馬之間，作拱手狀（圖1）。① 此石沒有榜題，當時閃過腦際下意識的直覺是：「這是馬上封侯嗎？」拍了照片，卻無法找到任何可以證明直覺的證據。

照片一放十五年，除了曾用來證明這幅畫像中有一部分寓有「射爵」之意，對人立在馬上的部分因無佐證，不敢揣測。② 直到去年（2007）底，見到河南、陝西和山東出土的三件新資料，才敢較肯定地說「馬上封侯」的畫像和裝飾母題在漢代造型藝術中的確已經存在。不過，再仔細想想，發現它們在表現形式上又不完全相同，是否都能說成是馬上封侯，或有其它意義，須要更多斟酌。因此使我聯想起學界對鄂爾多斯草原小型騎馬銅飾的一項爭議。以下就先從這個爭議說起。

一、人或猴騎馬?—鄂爾多斯草原小型銅飾的一項爭議

在鄂爾多斯草原地帶曾多次徵集到一種小型騎馬銅垂飾。王克林、田廣金、郭素新、安忠義、羅豐、韓孔樂等學者都將騎在馬上的人物看成是人，認為是西周至戰國晚期之間草原騎士的形象，稱之為騎馬銅人飾（圖2.1—3）。不過，吉林大學林澐教授引用美國學者艾瑪．邦克（Emma Bunker）之說，③ 認為在中國西北和內蒙古各地徵集的這類垂飾或小護身符不是騎馬的騎士，而是猴子騎在馬上，表示「馬上封侯」之意。

艾瑪．邦克討論的是一件黃銅質地的騎馬垂飾（圖3），原屬盧芹齋（C. T. Loo），後轉由美國賽克勒家族（Sackler）收藏。林澐認為由於「中國在唐代以前是不用黃銅來鑄造護身符的」，因此可以證明這件黃銅飾物年代甚晚，甚至

① 這件畫像現在已發表於孫桂儉編著的《漢畫石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67。

② 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2000），頁18。

③ 林澐，〈所謂“青銅騎馬造像”的考辨〉，《考古與文物》，4（2003），頁65-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到明朝。④ 他另舉東京國立博物館庫房中所藏這類垂飾以及明代瓷器上畫的猴子騎馬圖為證，支持艾瑪・邦克晚出之說。最後總結說道：「到目前為止，這種猴子騎馬的垂飾雖然發現數量甚多，但全都是徵集品，從來沒有在墓葬中發掘出來過。所以確切的年代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不過，田廣金、郭素新把它們歸於先秦時代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純出誤會，這是可以肯定的。」⑤

艾瑪・邦克和林澐之說如果能夠成立，自然會推翻了大多數學者過去的看法。但我在閱讀資料時，發現艾瑪・邦克立論的依據竟然有誤：

第一，她在其書中編號277，注明為明代黃銅護身符（amulet）的說明中，清楚說這一件是盧芹齋舊藏，高4.8公分，長5.7公分，重43公克，附有圖版，並注明原發表在阿弗瑞德・沙爾孟尼（Alfred Salmony）所著《盧芹齋藏中國－西伯利亞藝術品》（*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 1933）一書的圖版35:7。經查阿弗瑞德・沙爾孟尼原書圖版35:7，赫然發現它們竟然是十分相似，卻絕非相同的兩件銅飾（參圖2.3、3）。兩件基本造型幾乎完全相同，盧芹齋的一件沒有長度和重量資料，高則也是4.8公分。可是細審兩件馬尾的長短和形狀，一件有一處鏤空，另一件有兩處鏤空，馬頭下前胸的曲線也有異，即可輕易發現它們絕不是同一件東西。換言之，艾瑪・邦克立論所據的一件，絕不是

---

④ Sir Harry Garner早已指出中國商、周、漢代不像羅馬人，基本不用銅鋅合金的黃銅。參所著，"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Bronzes," *Oriental Art*, vol.6, no.4 (1960), pp. 130-135. 這篇論文承許雅惠小姐見示，謹謝。1973年在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一件半圓形黃銅殘片；此外，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曾出土兩件黃銅錐，山東棲霞楊家圈遺址出土黃銅殘片，浙江永嘉永臨區橋下公社西岸大隊修水渠時，發現春秋末至戰國時期青銅器窖藏，其中有「黃銅塊」五十多公斤（見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銅器簡介〉，《文物》，8（1980），頁16-17）。但這些出土太過零星，是否確為黃銅，還待驗證，似不足以證明中國自新石器時代以降已普遍使用黃銅。相對於紅銅、砷銅和青銅，早期黃銅製品出土可以說最少。較完整的討論可參滕銘予，〈中國早期銅器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北方文物》，2（1989），頁8-18；安志敏，〈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考古》，12（1993），頁1110-1119；白云翔，〈中國早期銅器中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收入社科院考古所編，《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180-203；彭適凡，〈中國冶銅術起源的若干問題〉，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312-329。感謝陳健文兄提供資料。

⑤ 林澐，〈所謂"青銅騎馬造像"的考辨〉，頁65-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阿弗瑞德・沙爾孟尼一書圖版35:7的那一件。

其次，艾瑪・邦克用以判定編號277這件護身符為黃銅質地（銅、鋅合金）的證據，並不是這件銅器本身經過科學檢驗，而是根據另一件形制相同，經科學檢驗的護身符（其書原文謂：“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identical amulet has identified the metal as brass, an alloy of copper and zinc.”）⑥ 換言之，認定編號277這一件為黃銅質地，是出於間接推定。林澐先生似乎沒有留意到上述這兩點。也就是說，艾瑪・邦克之說本身在材料上就有明顯錯誤，質地檢驗又是間接比對而來；如此，據其說以推翻它說，是不是站得住，就成了問題。

要解決兩造的爭議，一時還不太可能。因為除了艾瑪・邦克提到的一件經過科學化驗，證明為黃銅外，其餘銅垂飾或護身符的相關報告都極其簡略，有些根本沒說是什麼質地，或者沒經過質地檢驗；徵集品來源不明，就更不用說了。本文只想指出目前還不宜因艾瑪・邦克之說，而作出田廣金等人的舊說肯定「純出誤會」的結論。不論如何，艾瑪・邦克「馬上封侯」之說有啟發性，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 三件新出土的漢代「猴與馬」造型母題資料

本文的目的是想利用其它時代相對可考的考古出土品，提供另外一個思考的路子。也就是說，如果「猴與馬」的母題已在漢代造型藝術中出現，它應不僅僅出現在石刻畫像裡，應該也可能出現在陶、銅等其它器物的裝飾上。艾瑪・邦克所談的黃銅騎馬垂飾就算確為明代之物，明代瓷器上又常以猴子騎馬圖為吉祥裝飾，這些都無礙於其它非黃銅的「猴與馬」圖飾可以早於明代，甚至可以早到漢代或漢代以前（圖3.1—2）。⑦

前述滕州市博物館的畫像石出自滕州東寺院。該館所藏都是滕州一帶發掘

⑥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7), p. 298.

⑦ 石田英一郎曾討論歐俄草原出土，時代屬西元前後的猴騎馬垂飾，其造型和鄂爾多斯所見頗為不同。他也曾引另一件私人收藏，出土不明，但造型和鄂爾多斯所見極似。參《新版河童駒引考》，頁171及該書封裡圖版。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或徵集的文物。這方畫像石無論石質、形制或雕刻風格特徵都和滕州所出東漢畫像石一致，其為漢物，無可懷疑。遺憾的是馬上站立的是猴或是人，因刻畫漫漶，不易分辨。單用這一幅畫像論證漢代的馬上封侯母題，說服力不足。

2004年夏天我到鄭州河南博物院參觀，在「河南考古成果特展」的展場中見到一件南陽市出土的陶俑（圖4.1—2）。這是一件在河南經常出土的漢代陶馬，也是一件明確的出土品。有趣的是騎在馬上的不是人，而是一隻不折不扣的猴子。其特徵主要在頭部，突吻大眼，一眼即能認出是猴不是人。猴子左手似乎還抱著一隻小猴，但不是很清楚。目前我還在調查這件陶俑較詳細的出土資料和報告。不論如何，正如展場說明所說，它應是利用諧音，象徵馬上封侯。

第二件見於2007年《考古與文物》第2期。這一期報導了陝西西安南郊杜陵邑北側繆家寨漢代廁所遺址發掘成果。發掘簡報認為這個廁所遺址應是西漢晚期杜陵邑內居民建築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遺址中出土一件釉陶騎馬俑（圖5.1—2）。簡報描述如下：「為黃褐色釉陶，捏塑而成，細部簡單刻畫。馬做昂首嘶鳴狀，其上所騎為一猴子，圓眼尖腮，面向左側，似在左顧右盼，極為生動。長3.9，高4、最大寬1.6厘米。」⑧《考古與文物》這一期封裡刊有原件的彩圖。從彩圖看，馬上的騎者的確是猴子，不是人。

第三件見於《考古》2007年第3期。這一期刊載了山東東阿縣鄧廟漢畫像石墓出土的畫像石。⑨ 其中一號墓前室北面橫額畫像石的左端有一幅和前述滕州極相似，又不全同的馬上封侯圖。報告描述道：「前室北面橫額畫像畫面左側為一連理枝樹，樹上有六隻鳥及二個巢，樹左側立一馬，馬上站立一童子，樹右側立一人一猴」（圖6）。⑩ 可以稍作補充的是樹右側一人披髮，和馬上童子髮型相同；所謂的一猴，正在樹下作爬樹狀。此猴面部突吻大眼，和其他兩

⑧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繆家寨漢代廁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2007），頁15-20。

⑨ 陳昆麟、孫淮生、劉玉新、楊燕、李付興、吳明新，〈山東東阿縣鄧廟漢畫像石墓〉，《考古》，3（2007），頁32-51。

⑩ 陳昆麟、孫淮生、劉玉新、楊燕、李付興、吳明新，〈山東東阿縣鄧廟漢畫像石墓〉，頁36。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造型明顯不同，其為猿猴清楚無誤。這幅畫像中，立在馬上的是人，猴正攀援上樹，表現出「馬上逢（封）猴」的樣子，其寓意為馬上封侯，應無問題。考古報告判定此墓時代屬東漢晚期。

辨識出以上三件石和陶製品，不禁想到另兩件山東微山縣的漢畫像石（圖7、8）。一件著錄於《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九，另一件見於傅惜華《漢代畫像石全集》二編圖廿一。以前論證射爵射侯圖時，只討論了這兩圖樹下射鳥或猴的場面，忽略了樹下兩側騎或立在馬上的人。⑪ 傅惜華著錄的畫像上可以清楚看見樹右側下方，除了有一人仰首射鳥，還有一人立於馬上，這和東阿鄧廟、滕州兩石所刻十分類似。現在已可較完整地了解「馬上封侯」和「射爵射侯」的兩個畫像部分，寓意相似，可分別出現，也可合在一處。

另外一個可能合在一處的例子見河南新密市出土的漢畫像磚（圖9）。這塊磚的左側有一位正反身射虎的騎士（虎出現在相鄰的另一塊磚上），右側有一猴攀在馬背上，最右側有一樹，因刻畫十分簡略，看不清樹上是否有鳥，樹下則正有人仰首彎弓朝上而射。

漢代人喜歡利用諧音討吉利，以前我討論的射爵射侯圖是一例；馬上封侯可以說是另一例。從山東鄧廟出土的畫像、陝西西安南郊繆家寨、河南南陽市出土的陶塑和新密市出土的畫像磚，可以證實前述滕州的一件畫像石和微山縣兩石應該都是將「馬上封侯」和「射爵射侯」圖合而為一。它們都利用「猴」字的諧音，博取「得爵封侯」的彩頭，或可合而名之曰「馬上封爵封侯」圖。⑫

最後要提的是在香港徐展堂先生的藏品中有一件長25公分的褐綠釉陶馬。馬背上有一眼大似猴，腳似人者，屈一膝，雙手持弩而射（圖10）。⑬ 藏品圖錄以為屬東漢，謝明良先生認為可信，並以為可能出自河南濟源。如果可靠，我們就又多了一件造型稍有不同的參考品。

---

⑪ 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頁1-66。

⑫ 傅惜華著錄一石樹下左側有一婦人懷抱九子（圖8），應寓多子多孫之意。這樣的畫像有多件，也常見於漢代陶塑。其意須另文詳說，此處暫時擱下。

⑬ 徐氏藝術館，《陶瓷篇－新石器時代至遼代》，I（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圖46。這項資料承謝明良兄提示，謹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古今漢語中的「馬上封侯」

馬上封侯一說要能成立，還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漢代已有和我們今日白話中意義相同的「馬上封侯」成語嗎？今天漢語中的「馬上」，有兩義：一指馬背之上，而一般多用為形容副詞，指立即、即刻。今天漢語中的「馬上封侯」，也可以有兩解：一是沿古義（詳下文），指於馬背上立軍功而封侯；一是指能夠即刻或立即封侯。例如艾瑪・邦克在解說那件明代騎馬護身符時，就是依據後一義，將「馬上封侯」譯解為「立即封侯富貴」：“*Mashang fenghou*, literally may you immediately be elevated to the rank of marquis, which expresses the hope for prompt promotion and wealth.”⑭

但明代或更早，已有後一義的「馬上封侯」嗎？宋代黃庭堅詩〈次韻胡彥明同年羈旅京師寄李子飛三章〉曾有「原無馬上封侯骨」句。⑮ 這是我所能找到「馬上封侯」一詞最早的例子。此處之「馬上」仍為傳統馬背上之意。如果沒有立即之意的「馬上」，明代或明代以前又怎會出現以「馬上（立即）封侯」為寓意的裝飾之物呢？

在古代文獻裡，「馬上」二字原意毫無疑問是指馬背之上。陸賈說高祖天下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史記・陸賈列傳》）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再來看看為時較晚，《三國志・阮琳傳》和《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裡的兩個例子：

> 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三國志・阮琳傳》裴注引《典略》，

⑭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298.

⑮（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1094。學棣游逸飛曾代查黃庭堅和元雜劇資料，謹謝。曾有辭書（例如《辭海》，臺北：中華書局，1980台一版，頁4888以為元雜劇〈陳州糶米〉第三折張千云「爺，有的說，就馬上說了罷」的「馬上」是立即之意。）經查原劇此處前後文，「馬上」清楚是指在馬背上說話，並無立即之意。參《元雜劇選》（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5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01）

[孝文帝]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魏書．高祖紀》，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87）

這兩個例子裡的「馬上」無疑都是指馬背之上。阮瑀隨太祖出，馬上具草，當是指起草文稿於馬背之上；魏孝文帝於馬上口授文辭，情形相同。有趣的是這裡的「馬上」多少隱喻了他們具有捷才，能成文於片刻，又快又好，無須改訂。新、舊《唐書》在描述唐代薛收的捷才時，也是說他「言辭敏速，還同素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587）或「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891）在這兩個例子裡，「馬上」也應作馬背之上解，但同樣也多少以此形容薛收的敏捷。今天白話中文裡「馬上」意為立刻，或即淵源於此。

這些都是後話。我們必須回到漢朝的語言環境去了解這些造型藝術母題可能具有的寓意。漢代陶俑作猴騎馬之狀，或石刻中的人立或騎於馬背上，應該是象徵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語言意義：一是指馬背上，一是喻指因軍功或武力成為治人者或進入統治階層。高祖於馬上得天下，是以武力得天下之治權，成為最高的治人者。自秦孝公變法開始，秦代規定官員百姓的衣飾、車馬、田宅等須有等級，漢高祖更曾禁止商人不得衣絲、持兵器、乘車或騎馬（《漢書．高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5）。漢初秩一百六十石以上的官員有車可乘；無車者，乘馬。漢代為官為吏，須有一定的貲產，其貲產須足以自備車馬衣冠；貲產不足，會失去為吏的資格。⑯ 在漢代，車馬是官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象徵。造型藝術中的猴或人騎馬，應是單純喻指「馬上有猴（侯）」或「馬上逢（封）猴（侯）」，並無立即、即刻之意。這和元明以降或今天漢語中的「馬上（立即）封侯」有所不同。

漢代這些表現馬背上逢猴或有猴的造型藝術品，以可考的例子來說，表現的形式可約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立於桂（貴）樹下，或騎或立於馬上，樹

⑯ 參江陵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簡470－472及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2003），頁8及注15；邢義田，〈從居延漢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新史學》，3:1（1992），頁111-116。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上有雀（爵）或有猴（侯）正要攀援而上；一類是猴騎在馬上。馬上有猴，隱喻乘馬為官的人，可望進爵封侯。在漢代，這些無疑都是用於表達為官封侯的願望。

可是在不同的環境裡，猴也可以就是猴，用原義，而不用諧音義，其寓意也會有所不同。這是本文特別要說的寓意的多重或多樣性。

四、對草原小型騎馬銅飾製作時代的再思

回頭看看鄂爾多斯草原上徵集的騎馬小型銅質垂飾。現在已有較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其出現的時代可以遠遠早過明代，甚至早到漢至戰國。第一，寓有「馬上封侯」意義的裝飾母題在漢代，如前文所說，證實已經出現在陶俑和石刻上，因此也有可能出現在這一時期的銅器上；第二，現在已有了較多的證據可以證明草原地區出土的銅飾，誠如艾瑪・邦克所曾論證的，有不少出自華夏工匠之手。⑰ 這些戰國至秦漢的中國工匠固然可以投游牧民之所好，製作有草原藝術風格的金、銀或銅飾，有時不免會將中原藝術的母題融入作品，「猴騎馬」這樣的造型或許就是其中之一。

以下先以一件艾瑪・邦克將年代定為漢代的「騎士」造型衣鉤為例（圖11）。這一件小巧的青銅鑄造衣鉤長4.4公分，寬2.9公分，重16公克。艾瑪・邦克描述衣鉤形式「是一匹近乎側面的馬，其上坐著一位正面朝前的騎者」。在形式上，艾瑪・邦克認為「它是典型中國式的衣鉤。但是由於以騎士為主題，它也曾被認為具有草原游牧藝術風格，歸於中國北疆文物之林。同樣大小的帶鉤曾在內蒙古出土，雖然造型不同。這些小衣鉤是否是中國為北方市場所造，不能確定。」⑱

---

⑰ Emma Bunker, "Dangerous Scholarship: On Citing Unexcavated Artifacts from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Orientations*, June 1989, pp. 52-59, esp. 58-59; "Gold Belt Plaques in the Siberian Treasure of Peter the Great: Dates, Origins and Iconography" in Gary Seaman ed., *Foundation of Empir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201-222.

⑱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裡要強調的是：第一，它被認定屬於漢代，第二，它為青銅質地，第三，它表現一位騎士騎在馬上。艾瑪．邦克雖不能確定它是否是中國為北方市場所造，不過她說它是「典型中國式的衣鉤」（typical Chinese garment hook），多少暗示了它的原產地應為中國。那匹側面的馬，不論馬頭和腿腳，在表現風格上，的確和漢代可考的陶、木、石馬相近，而和斯基泰式風格有一定的距離（圖12.1—4）。艾瑪．邦克認為它是中國式的，可以接受。不過那位「騎士」在造型上顯得十分奇特。第一，他的頭呈圓形，和身體相比，頭顯得特別大。頭頂左右各有微微突起半圓形之物，似有兩髮髻。這樣的髮型很難說是中國式的。類似這樣大圓頭的小銅人或銅人騎馬飾，反而西從高加索中北部的庫班文化（Koban culture），東到西伯利亞和鄂爾多斯草原都曾出土（圖13.1—5）。第二，騎者臉部雖不完全清楚，可以看清其左右各有一隻大眼，兩眼佔據面部幾乎三分之一的空間，這也不是漢代或漢代以前華夏諸國藝術中人物造型的「典型」。⑲ 其鼻吻部不突出，甚至似乎是以凹入剔雕的方式刻出嘴角上彎的嘴部；他是胡人或漢人，不易確定。最重要的是這種形制的衣鉤應不是漢代一般男女衣裳的配件，比較像是草原游牧民衣物上的東西。也就是說，這應是一件具有若干中原華夏風格，也有若干草原特色，為草原游牧民製作的青銅衣物配件。

1997年艾瑪．邦克出版其書時，她還不能確定這件青銅配件是否為中國工匠所造。兩年後，1999年在西安北郊北康村出土了一座戰國鑄銅工匠墓（M34），使得中國工匠為北疆市場鑄造金銅飾物之說增添了有利的證據。這座墓裡出土一批鑄銅陶模具、陶器、銅器、鐵器、漆器和石器，其中有25件

⑲ 中國境內出土的騎士造型銅器目前可追溯到內蒙古寧城南山根三號墓出土，屬於西元前九至八世紀夏家店上層繁榮期文化的一件銅環。環邊鑄出兩位騎馬追兔的騎士和一隻兔子。這兩位騎士的頭部都並不特別大。參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83，圖版54.9。戰國青銅器中的騎士也是如此。例如綏遠出土的一件青銅射箭騎士及傳為洛陽金村出土銅鏡上的搏虎騎士，都沒有特別突顯頭部或眼部的情形，參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50再版），圖版四（其線描圖參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美術史研究集刊》，9期（2000），頁95，圖80）；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出版部，1937）。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 期刊資料庫

陶模和鄂爾多斯式青銅飾牌和其它器物構件有關。據發掘者報告，從葬式和墓中器物可以推知墓主無疑是中原漢族的鑄銅工匠，而其鑄造用的陶模有人物紋飾牌、馬紋飾牌、雙羊紋飾牌、雙馬紋飾牌、鷹虎搏鬥紋飾牌模等（圖14.1—3），這些都和鄂爾多斯式青銅牌飾類似，甚至和中亞出土斯基泰式飾牌頗為相似（圖15），可以相當明確地證明在鄂爾多斯草原帶出土或徵集的這類飾牌，最少有一部分是中原的產物。⑳

林澐教授認為這些鄂爾多斯的銅質騎馬垂飾上的騎者不是人，而是猴。這個結論完全正確（圖2.1—2）。如果這一點確定，那麼從戰國到秦漢時代，中原工匠為草原游牧民鑄造小型銅飾，將中原漢人喜歡的「猴騎馬」母題帶入銅質垂飾的造型中，可能性就存在了。尤其是這個造型母題包含了草原游牧民生活中最親近和喜歡的馬。如果能進一步分析相關出土品是青銅或黃銅，當更有助於判斷它們製作的時代。以下再舉一件時代屬西漢晚期的旁證。1939年在今哈薩克共和國阿耳馬提（Almaty）以西55公里卡耳格利（Kargaly）出土一件鑲綠松石的金冠飾。冠飾已斷裂為兩部分，其上有具草原藝術特色的大角鹿、熊和翼馬，也有騎在帶翼神獸上的羽人（圖16.1—2）。㉑ 這些羽人手持仙草之類，披髮背羽，身材特別瘦長，和漢代銅、漆、陶器或石刻中常見的造型幾乎完全一樣。它們為何會出現在游牧民族才有的金冠飾上？似乎只有中原工匠為他們製造，將中原造型藝術中常見的元素融入，才是比較可能的解釋。

五、「猴與馬」造型母題寓意的轉變或多重化

草原地帶出土這麼多「猴騎馬」的垂飾，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造型形式和寓「馬上封侯」之意的造型畢竟有異，單純猴騎在馬上的造型的原產地在那兒？

⑳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9（2003），頁4-14；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120-133。其它相關證據可參註17及 Katheryn M. Linduff with Emma Bunker and Wu Wen,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 in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pp. 52-53.

㉑ 感謝法國畢梅雪教授（Me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提供她所拍攝的金冠照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它是創自中原，而後傳入草原？或正相反，由草原傳入中原？也必須一問：這個裝飾母題在不同的地域或社會中，是否曾有意義或功能上的轉變？或者說是否會在原有的寓意和功能之外增添新的寓意和功能？

草原游牧民對「猴騎馬」垂飾應該曾有自己的理解和接受的理由，但不排除同時也曾接受這一母題其它的寓意。因為從漢文帝以後，匈奴和其他草原游牧民歸順和接受漢王朝封號和印綬的不計其數。他們經常接受漢王朝的賞賜，不免受到漢人某些象徵符號和語言文化的影響。換言之，在文化交流的情形下，類似的藝術母題在不同的環境裡，可以同時蘊含多重或不同的意義。

有什麼其它的意義呢？據石田英一郎研究，伊朗、印度和中西亞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普遍相信猴子能治或防止馬、牛、羊等牲畜的疫病。石田曾廣泛蒐集中國、印度和中亞文獻及相關出土文物，羅列不少資料。㉒ 例如印度的故事集《五卷書》中有一個「猴王復仇記」的故事。故事中提到印度古代有一部獸醫著作《舍利護多羅》，宣稱「馬受了燒傷，用猴子油可以治好」。㉓ 又如干寶《搜神記》曾提到西晉永嘉年間將軍趙固愛馬忽死，郭璞利用猿猴使死馬復活：

>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宜急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㉔

㉒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頁153-173 引 *Pantchatantra*, bk.5, no.10: Benfey(tr.), 1859, 2. Theil, SS. 346-352, bes. 348-349. 本文所引其它資料多得力於此書。劉欣寧在京都大學代為找到據梵文英譯的另一版本，Arthur W. Ryder, *The Panchatantr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pp. 454-462, 謹謝。另感謝許雅惠在電子版伊朗百科全書(*Eycyclopaedia Iranica*)「猴子」條中，代為找到印度傳說中猴子有治馬傷的能力。參*Eycyclopaedia Iranica*, “Buzina”條，頁587. http://www.iranica.com/articlenavigation/index.html(2008.3.27) 百科全書引用的資料出自 A. de Gubernatis, *Zoological Mythology or the Legends of Animals*, 2 vols, (London, 1872), II, p. 105, n.2.

㉓ 季美林譯，《五卷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再版），頁385-391；又見季美林譯，《五卷書》（臺北：丹青出版社，1983），頁504-507。承劉欣寧告知，謹謝。

㉔ 干寶，《搜神記》（臺北：里仁出版社，1982），卷3，頁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個故事也見於《晉書．郭璞傳》和《搜神後記》等書，乍看似乎和猴防馬疫之說無關，但宋洪邁《夷堅志》辛集卷四「孟廣威彌猴」條提到徽宗時陝人孟廣威好養馬，「常畜獼猴於外廄，俗云與馬性相宜」，㉕ 又北宋許洞《虎鈐經》卷十「馬忌」條說：「養獼猴於坊內，辟患并去疥癬。」㉖ 南北宋之間的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死馬醫」條引錄郭璞故事並謂「故養馬家多畜猴，為無馬疫」。㉗ 此外，明代陳仁錫《潛確類書》卷111說「沐猴宜馬」，㉘ 又明代謝肇淛《五雜俎》卷9明白說「置狙于馬廄，令馬不疫。」接著又提到：「《西遊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為弼馬溫，蓋戲詞也」。㉙《本草綱目》卷51下〈獼猴〉條李時珍也明確指出「養馬者廄中畜之，能辟馬病。胡俗稱馬留云，梵書謂之摩斯咤。」㉚ 類似的信仰和習慣也見於十三、四世紀以降的日本。在鎌倉時代的繪卷中有馬廄旁畜猴的描繪（圖17.1—2）。㉛ 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王迅在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論證。他舉出唐末五代時韓諤《四時纂要》所載：「常繫彌猴於馬坊內，辟惡消百病，令馬不患疥。」以及《西遊記》中

㉕ 洪邁，《夷堅志》（臺北：明文書局，1982），辛集卷4，頁1417。

㉖ 參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卷10，頁13下（電子本），迪智公司授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使用。

㉗ 朱翌，《猗覺寮雜記》見《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下，頁54-55。

㉘ 陳仁錫，《潛確類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三至五年（1630—1632）刊本）卷111，飛躍部8，家畜1，沐猴宜馬條，頁26下。

㉙ 謝肇淛，《五雜俎》，收入李肇翔等編，《四庫禁書》（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第10冊，卷9，頁7539。以上資料原見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頁166-168。本文稍有增補。

㉚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草綱目》卷51下〈獼猴〉條，時珍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本）第774冊，頁516。

㉛ 增田精一，《日本馬事文化の源流》（東京：芙蓉書房，1996），頁116-128。猴可防馬病的信仰在日本的情況還可參網站A to Z Photo Dictionary: Japanese Buddhist Statuary, http://www.onmarkproductions.com/html/monkey-koushin-p3.html#three-monkeys (上網日期：2008.1.28)

㉜ 王迅，〈鄂爾多斯猴子騎馬青銅飾與《西遊記》中弼馬溫的由來〉，《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431-434；張勃，〈“弼馬溫”與避馬瘟〉，《民俗研究》，1（2000），頁174-176。張勃文由丁瑞茂兄提示，謹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玉皇大帝封孫悟空為弼馬溫（與「避馬瘟」諧音）等證據。㉜

有無更早的證據呢？稍作查考，即發現《四時纂要》之說其實是抄自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據繆啟愉校釋本，《齊民要術》有這樣的記載：「《術》曰：常繫彌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㉝《齊民要術》所引的《術》，不知何書，《齊民要術》曾多次徵引。繆啟愉依據徵引的內容，指出《術》當是雜錄辟邪厭勝之術而成的書。㉞ 賈思勰既然引自其時已存在的書籍—《術》，畜猴以避馬病之說就有可能再往前追溯。前述郭璞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可上推到晉的線索，由此或可再上追到漢代。

上追到漢，目前僅有若干旁證。第一是東漢王延壽《王孫賦》曾長篇形容猴子的形貌，棲息的環境和動作特色，並於賦末提到「遂纓絡以縻羈，歸鎖于庭廄」。㉟ 賦中沒有說繫猴於庭廄有防疫的作用，但可旁證東漢有繫猴於庭廄這樣的事。

另一個旁證是漢代居延金關出土的猴與馬木板畫。1973年在甘肅金塔縣漢代居延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了一件木板畫，畫的主題是猴、馬和人（圖18）。在長25.5公分，寬20公分拼接而成的木板左側，以極為簡率的筆觸，畫有一樹，樹下有一繫馬，馬背上方有一隻描畫極簡，兩手攀援在樹枝上，兩腿分開的猴子，另有兩隻姿態類似，但較小的猴子攀援在左右側的樹枝上。畫面右下方站立一人，一手執鞭，像是養馬的人。過去一直不見有人解釋這方木板畫的意義。如果考慮畜猴避馬病之說，漢代邊塞多養馬以及金關邊塞經常接觸草原游牧民，猴與馬的木板畫在金關發現，其意義不難由此猜得三分。有猴的地方固可畜猴於廄，沒有猴子的北方和西北，或即以畫代之。這是漢代的一種厭勝方式。

第三個旁證是四川成都曾家包包出土的東漢墓畫像石。畫像上出現馬車和繫馬，其旁有一隻攀於立柱上的猴子，立柱下放著餵馬料的槽（圖19）。由於整幅畫面還有織布、製酒、汲井、燒灶和牛車載物等十分生活化的場景，馬和

㉝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第2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卷6，頁406。

㉞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卷4，頁270，注18。

㉟參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卷58，頁791王延壽條引《藝文類聚》95、《初學記》29、《太平御覽》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猴部分應該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描述。

第四件旁證是河南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南耳室西壁石刻畫像描述馬廄有四、五匹馬正在吃著馬料（圖20）。「四匹馬的前面都有一根栓馬樁和一個馬槽」「有的栓馬樁上刻有猴等形象，姿態甚為生動。」㊱

以上這些雖不能直接證明畜猴以防馬病之說的存在，但猴與馬的畫像一再出現於今天的內蒙古、四川和河南，似非偶然，多少意味著畜猴防馬疫習俗存在的可能。因為自漢文帝和武帝在北和西北疆廣置養馬苑，大事養馬以後，曾利用擅長養馬的游牧民代為養馬（武帝時用匈奴降人金日磾為馬監，就是最著名的例子）。㊲游牧民防止馬、羊等疫病的技術或信仰，不免隨之傳入中土。

不同文化之間接觸，交流常是雙向的。漢代造型藝術中，原寓「馬上封侯」之意的圖飾會出現在中原工匠為游牧民製作的垂飾上；同樣地，漢代人也不免受到游牧民族信仰的影響，開始相信畜猴可以消馬百病。同一個猴與馬藝術母題以不同的形式，在漢代中國或草原游牧民之間流播。它可以有相同，也可以有不同或者說多重的意義；多重意義的比重對漢人和對游牧民而言，不必相同。

如果承認草原民族有猴防馬疫的信仰，而這樣的信仰又曾傳入中土，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何在草原和中原，都曾出現單獨猴子造型的銅飾和帶鉤。產猴的地區如巴蜀或河南固可畜猴於馬廄，不產猴的地區如西北邊塞或草原，則可利用圖畫、佩帶垂飾或帶鉤等等不同的方式，以厭勝和象徵的方式達到相同的目的。盧芹齋舊藏一件青銅猴垂飾（圖21.1），出土與時代不明。阿弗瑞德・沙爾孟尼認為它屬於西元前第二千紀，並提到俄國學者拉德洛夫（W. Radloff）在阿爾泰山墓葬中曾發現時屬漢代的母子雙猴骨雕，指出猴子母題在草原存在極早

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打虎亭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99、102-103，圖77、78。

㊲ 例如敦煌懸泉簡中有不少驪靬苑的資料，其中即可能有胡人為苑奴，為漢人養馬。參邢義田，〈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古今論衡》，13（2005），頁52-58。

㊳ A.Salmony認為其時代可以上溯到西元前第二千紀，實可疑。參A.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 p.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極久。㊳ 在艾瑪・邦克登錄的私人收藏中，另有一件屬西元前四至三世紀鑲嵌綠松石的猴形青銅帶鈎（圖21.2）。艾瑪・邦克指出在東周末至西漢初的青銅飾品中，經常可以見到猴子母題而猴形帶鈎在公私收藏中都有。這一件鑲嵌綠松石的猴形帶鈎和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出土約屬西元前四世紀的銀質猴形帶鈎造型十分相似（圖21.3）。㊴ 這些銅飾和帶鈎如果佩戴或用在騎馬者的身上，應可同樣發揮防馬百病的作用。

如果這一推想能夠成立，則猴防馬病之說的流入中土又可自漢代上推到西元前四世紀的戰國時代。除了一些疑屬戰國較不明確的傳世品，㊵ 有不少齊故城臨淄出土的半瓦當紋飾可以證明樹下有馬、牧馬人或騎馬人，樹上有鳥和猴的母題在戰國時已流行於齊地（圖22.1-3）。㊶ 這很可能是漢代山東地區畫像中類似母題的淵源。㊷ 很可惜我們無法知道這些瓦當屬於那些建築（人的居室或馬廄），我懷疑它們可能已寓有猴防馬病或馬上封侯的意義。至於那種意義出現較早？目前還不敢遽然論斷。

㊴ Emma Bunker,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p. 146.

㊵ 在美國收藏家的藏品中有一件上漆木質器，造型和魯國故城出土的銀質猴形帶鈎極為相似，也被認為是戰國末至西漢製品。參Donald Jenkins, *Mysterious Spirits, Strange Beasts, Earthly Delights, Early Chinese Art from the Arlene and Harold Schnitzer Collection*, (Oregon: Portland Art Museum, 2005), pp. 54-55. 感謝同事陳昭容女士提供此書。此外，還有一件傳源自湖南長沙戰國墓葬的帶彩漆木杖，全杖長五十八英吋，杖端為一帶角羊頭，羊頭頂蹲坐一隻猴子。這件羊與猴為母題的杖飾也值得注意。參A.Salmony, "A Ceremony Wand from South China," *Artibus Asiae*, vol.15, no.1/2 (1952), pp. 129-136; E.C. Bunker, C.B. Chatwin and A.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p. 97, pl. 77.

㊶ 參關野雄，《半瓦當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2），圖版20、21-39；李發林，《齊故城瓦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21-47；傅嘉儀，《中國瓦當藝術》，下冊（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751-772。

㊷ 安立華先生已指出這一點，個人完全贊同。參安立華，《齊國瓦當藝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結論

總之，本文無意斷言鄂爾多斯出土或採集到的銅質騎馬小型垂飾都是漢代或漢以前之物。這須要更進一步檢驗垂飾的質地，並了解相伴物品的年代。本文僅僅希望證明在漢代造型藝術中已存在著「馬上封侯」的母題，戰國至漢代的華夏工匠有可能曾為草原游牧民製作猴騎馬小型垂飾。因此還不宜一口咬定這些銅飾都屬晚期，甚至是明代以後之物，或者說它們僅僅表示馬上封侯而已。因為它們也可能另寓畜猴以避馬百病的意義和作用。

本文仍有些問題不能解決：即使承認草原游牧民普遍相信畜猴可以防馬百病，造型藝術品會以怎樣的形式表現這樣的信仰呢？如何確認猴騎馬的造型就是反映這一信仰？說實在，沒有直接證據。再者，單獨的猴形銅飾或帶鈎、猴騎馬和樹下有人立於馬上或有猴攀樹，樹旁有馬的造型是否可能有其它的意義？應各作解釋？都還沒有完全確切不移的答案。

第三，以上這些和猴與馬母題相關的不同造型，彼此之間關係如何？那些源自中原本土？那些源自中土之外？目前只能暫作揣測。從目前可知的資料時代先後看，有些草原地帶的猴騎馬銅垂飾要早於河南、陝西等地出土的猴騎馬陶俑，也早於居延出土樹上有猴，樹下有馬的木板畫和山東、河南、四川出土的「馬上封侯」或馬廄畜猴的東漢畫像石、磚。因此不無可能戰國時代的中原工匠即開始為草原游牧民族製造原寓猴防馬病意義的銅飾，隨著游牧民族和華夏農業社會的接觸，善於養馬的游牧民不免將他們相關的技術和信仰帶入中原。這樣的母題進入中原以後，有些保持了大體相似的造型特色和寓意，有些則發生了像山東畫像石上那樣的造型和寓意上的變化。寓馬上封侯之意的裝飾也可因華夏工匠的製作，再傳回草原，而為草原民族所接受。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互動過程，情形到底如何？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期待方家指教。

2007.10.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記〉

撰寫過程中承蒙好友劉增貴、陳昭容、陳健文、許雅惠、丁瑞茂、畢梅雪教授（Me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和學棣劉欣寧、游逸飛的指正和協助，謹此致謝。寫成後，心不自安，求教於謝明良兄。明良兄又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南方熊楠著，欒殿武譯，《縱談十二生肖》（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76—479曾談及中外以猴防馬疫的種種記載，值得參考。在此特別謝謝他。唯一切錯誤，仍由作者自行負責。

（責任編輯：方令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東晉）干寶

《搜神記》，臺北：里仁出版社，卷3，頁37，1982。

江陵張家山漢墓

竹簡《二年律令》，簡470－472。

（宋）朱翌

《猗覺寮雜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卷下，頁54-55，1985。

（明）李時珍

《本草綱目》卷51下〈獼猴〉條，《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774冊，頁516。

（宋）洪邁

《夷堅志》，臺北：明文書局，辛集卷4，頁1417，1982。

（明）陳仁錫

《潛確類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三至五年刊本，卷111，飛躍部8，家畜1，沐猴宜馬條，頁26下，1630—1632。

（宋）黃庭堅

《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1094，2001。

（清）《欽定四庫全書》

卷10，頁13下（文淵閣電子本）。

（明）謝肇淛

《五雜俎》，收入《四庫禁書》，北京：京華出版社，第10冊，卷9，頁7539，2001。

近人論著

王迅

1998　〈鄂爾多斯猴子騎馬青銅飾與《西遊記》中弼馬溫的由來〉，《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頁431-434。

白云翔

2002　〈中國早期銅器中的考古發現與研究〉，《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80-203。

安立華

1998　《齊國瓦當藝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10。

安志敏

1993　〈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考古》，12期，頁1110-1119。

邢義田

1992　〈從居延漢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新史學》，第3卷第1期，頁111-1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0 〈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卷1期,頁1-66。
2003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頁8,注15。
2005 〈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古今論衡》,13期,頁52-58。

李發林
1990 《齊故城瓦當》,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1-47。

季羨林譯
1979 《五卷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385-391。
1983 《五卷書》,臺北:丹青出版社,頁504-507。

林澐
2003 〈所謂“青銅騎馬造像”的考辨〉,《考古與文物》,4期,頁65-66。

徐定水
1980 〈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銅器簡介〉,《文物》,8期,頁16-17。

孫機
2007 《漢畫石語》,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6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3 〈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9期,頁4-14。
2006 《西安北郊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頁120-133。
2007 〈西安南郊繆家寨漢代廁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期,頁15-20。

陳昆麟、孫淮生、劉玉新、楊燕、李付興、吳明新
2007 〈山東東阿縣鄧廟漢畫像石墓〉,《考古》,3期,頁32-51,頁36。

彭適凡
2003 〈中國冶銅術起源的若干問題〉,《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12-329。

張勃
2000 〈“弼馬溫”與避馬瘟〉,《民俗研究》,2000年1期,頁174-176。

傅嘉儀
2002 《中國瓦當藝術》,下冊,上海:上海書店,頁751-772。

滕銘予
1989 〈中國早期銅器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北方文物》,2期,頁8-18。

繆啟愉
1998 《齊民要術校釋》(第2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卷6,頁406、卷4,頁270,注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嚴可均
1981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卷58，頁791王延壽條引《藝文類聚》95、《初學記》29、《太平御覽》910。
1991 《元雜劇選》，臺北：世界書局，頁537。
石田英一郎
1966 《新版河童駒引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153-173 (引 *Pantchatantra*, bk.5, no.10: Benfey(tr.), 1859, 2. Theil, SS. 346-352, bes. 348-349.)、頁166-168、171。
梅原末治
1937 《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出版部。
增田精一
1996 《日本馬事文化の源流》，東京：芙蓉書房，頁116-128。
Bunker, Emma
2002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 146.
1989 "Dangerous Scholarship: On Citing Unexcavated Artifacts from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Orientations*, pp. 52-59, esp. 58-59.
1992 "Gold Belt Plaques in the Siberian Treasure of Peter the Great: Dates, Origins and Iconography" in Gary Seaman ed., *Foundation of Empir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 pp. 201-222.
1997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p. 298.
Bunker, E.C., Chatwin, C.B. and Farkas, A.R.
1970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p. 97, pl. 77.
de Gubernatis, A.
1872 *Zoological Mythology or the Legends of Animals*, London, 2 vols, II, p. 105, n.2.
Garner, Sir Harry
1960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Bronzes," *Oriental Art*, vol.6, no.4, pp. 130-135.
Jenkins, Donald
2005 *Mysterious Spirits, Strange Beasts, Earthly Delights, Early Chinese Art from the Arlene and Harold Schnitzer Collection*, Oregon: Portland Art Museum, pp. 54-55.
Linduff, Katheryn M., Bunker, Emma and Wen, Wu
1997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 in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pp. 52-53.
Ryder, Arthur W.
1925 *The Panchatantr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54-462。
Salmony, A.
1993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 p.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52 “A Ceremony Wand from South China,” *Artibus Asiae*, vol.15, no.1/2, pp. 129-136.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A to Z Photo Dictionary: Japanese Buddhist Statuary, 2008.1.28
http://www.onmarkproductions.com/html/monkey-koushin-p3.html#three-monkeys
Eycyclopaedia Iranica, “Buzina,” p. 587, 2008.3.27
http://www.iranica.com/articlenavigation/index.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滕州市博物館，1992.3.10，作者攝

圖2.1　林澐，〈所謂“青銅騎馬造像”的考辨〉，《考古與文物》4（2003），頁65-66

圖2.2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田廣金、郭素新編著，《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圖版89

圖2.3　A.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T.C.Loo* (1933), plate. 35.7

圖3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7, no.277

圖3.1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封裡

圖3.2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封裡

圖4.1　河南博物院，2004.7.13，作者攝

圖4.2　河南博物院，2004.7.13，作者攝

圖5.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繆家寨漢代廁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2007），封裡

圖5.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繆家寨漢代廁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2007），頁15-20

圖6　陳昆麟、孫淮生、劉玉新、楊燕、李付興、吳明新，〈山東東阿縣鄧廟〉，《考古》3（2007），頁32-51

圖7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圖9

圖8　傅惜華，《漢代畫像全集》二編（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0-51），圖21

圖9　《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2河南畫像磚（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1950-51），圖62

圖10　徐氏藝術館，《陶瓷篇－新石器時代至遼代》（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圖46

圖11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7, no.269

圖12.1-2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2, p.41, plate 21

圖12.3　V.Schiltz, *Les Scythes et les nomads des steppes*, Gallimard, 1994, p.352

圖12.4　東亞考古學會編，《內蒙古 長城地帶》（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5），頁134，圖85

圖13.1-3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田廣金、郭素新編著，《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物出版社，1986），圖版9

圖13.4 東亞考古學會編，《內蒙古 長城地帶》（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5），頁134，圖88

圖13.5 E.C. Bunker, C.B.Chatwin, *A.R.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p.45, plate 27

圖14.1-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9（2003），頁4-14

圖14.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彩版1

圖15 V.Schiltz, *Les Scythes et les nomads des steppes*, Gallimard, 1994, p.252

圖16.1 法國畢梅雪教授（Me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提供照片，原藏Museum of Kazakhstan in Almaty, Kazakhstan

圖16.2 法國畢梅雪教授（Me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提供照片，原藏Museum of Kazakhstan in Almaty, Kazakhstan, 邢義田摹本

圖17.1 增田精一，《日本馬事文化の源流》（東京：芙蓉書房，1996），頁125

圖17.2 小松茂美，《日本繪卷大成》18（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石山寺繪卷第十七紙

圖18 大阪府立近つ飛鳥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のまもり》，1994，圖38

圖19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漢畫像石（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圖43

圖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打虎亭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圖78

圖21.1 A.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T.C.Loo*, 1933, plate.35.9

圖21.2 Emma Bunker,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p.146, no.122

圖21.3 《大黃河文明の流れ－山東省文物展》，日本山口縣西武美術館，1986，頁107，圖61

圖22.1-2 關野雄，《半瓦當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2），圖版20、34

圖22.3 傅嘉儀，《中國瓦當藝術》（上海：上海書店，2002），圖1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滕州市博物館藏 1992.3.10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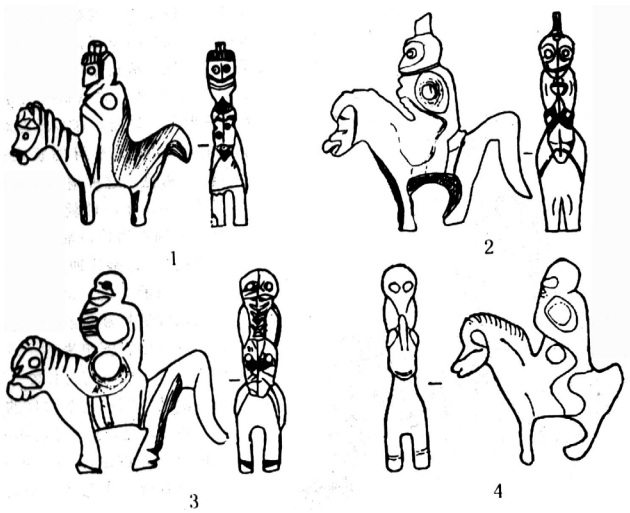


圖2.1　轉見林澐《考古與文物》4（2003）頁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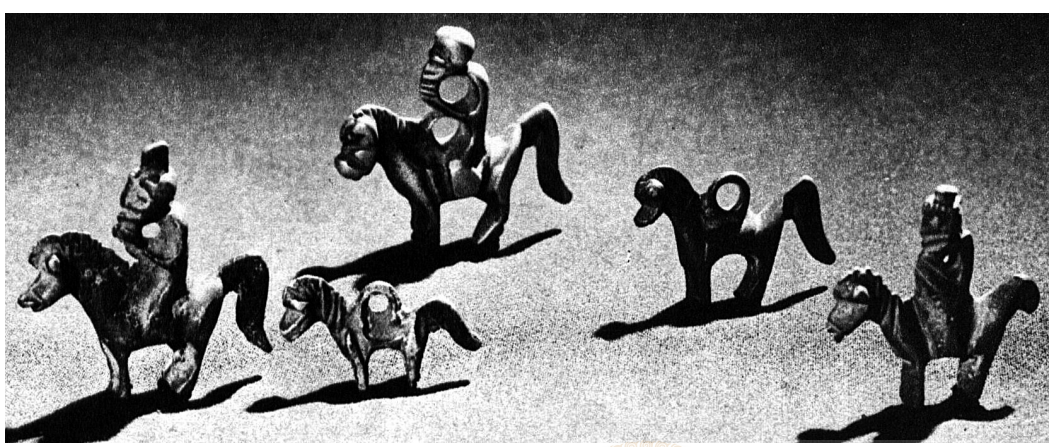


圖2.2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圖版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 A. Salmony 1933 pl. 35.7



圖3 E. Bunker 1997 no.277



圖3.1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封裡



圖3.2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駒引考》封裡



圖4.1 河南南陽市出土陶俑
2004.7.13 作者攝於河南博物院



圖4.2 河南南陽市出土陶俑
2004.7.13 作者攝於河南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1　西安繆家寨出土
《考古與文物》2（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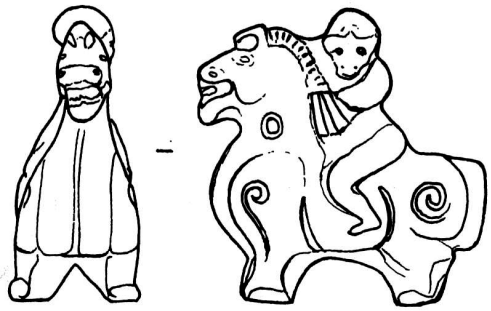


圖5.2　5.1之線描圖 《考古與文物》2（2007）



圖6　山東東阿縣鄧廟一號漢墓
《考古》3（2007）



圖7 《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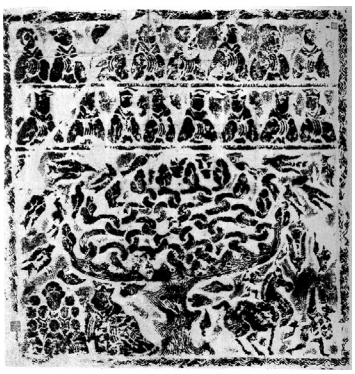


圖8 傅惜華《漢代畫像全集》二編 圖21



圖9 河南畫像磚《中國畫像磚全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徐氏藝術館《陶瓷篇》I 圖46



圖11 E. Bunker 1997 no.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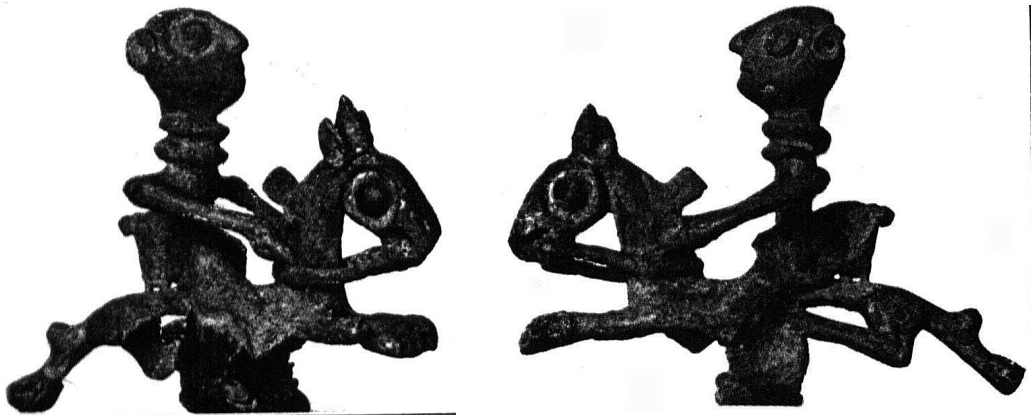


圖12.1-2 黑海北岸Kuban出土 冬宮博物館藏



圖12.3 Mongolie出土 西元前五至三世紀



圖12.4 西伯利亞出土騎馬金飾（左）石刻線描圖（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1-3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圖版9



圖13.4　西伯利亞出土
《內蒙古長城地帶》



圖13.5　E. Bunker　9-7Century BC
"*Animal St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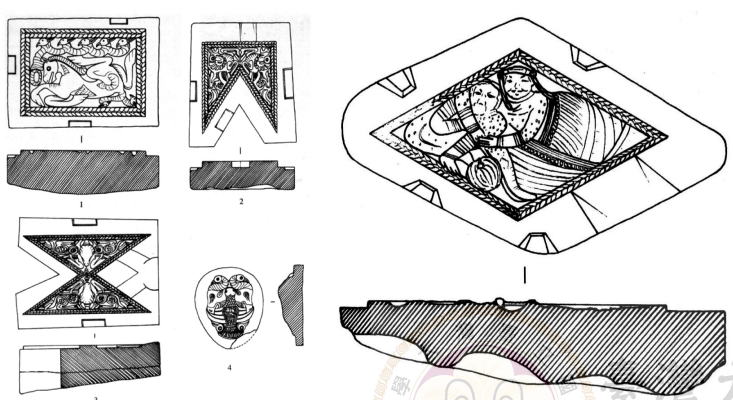


圖14.1-2　《文物》9（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3 《西安北郊秦墓》彩版1



圖15 中亞Touva出土 西元前五至三世紀



圖16.1 哈薩克共和國卡耳格利出土金冠飾殘件之一
Museum of Kazakhstan in Almaty
法國畢梅雪教授（Me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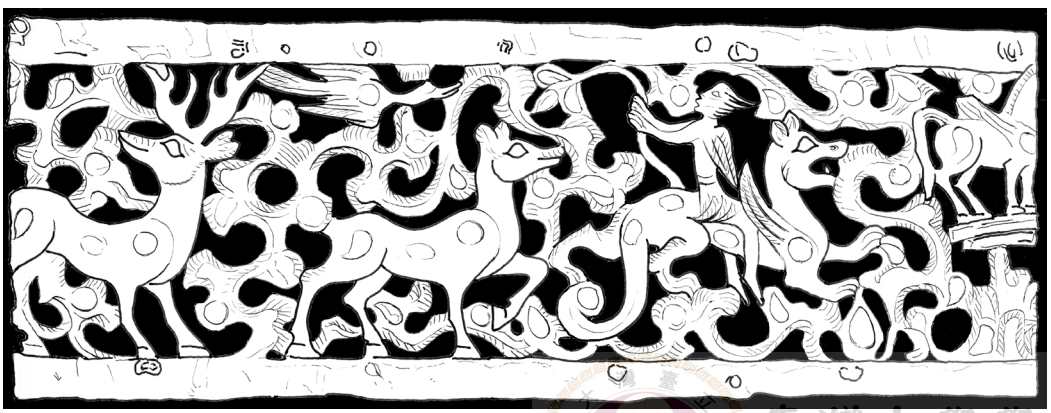


圖16.2 哈薩克共和國卡耳格利出土金冠飾殘件之二
邢義田據畢梅雪教授提供照片所作摹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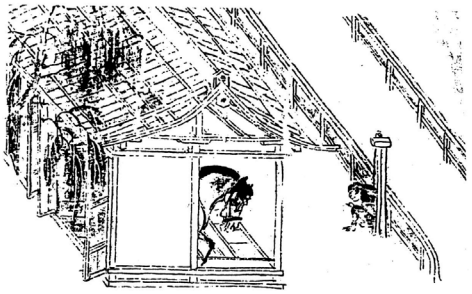


圖17.1　「一遍聖繪」中的馬廄和猴
日本鎌倉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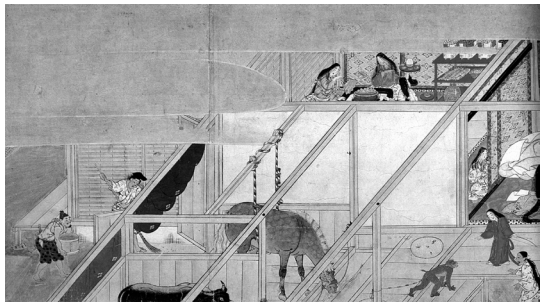


圖17.2　「石山寺緣起」繪卷第十七紙
日本鎌倉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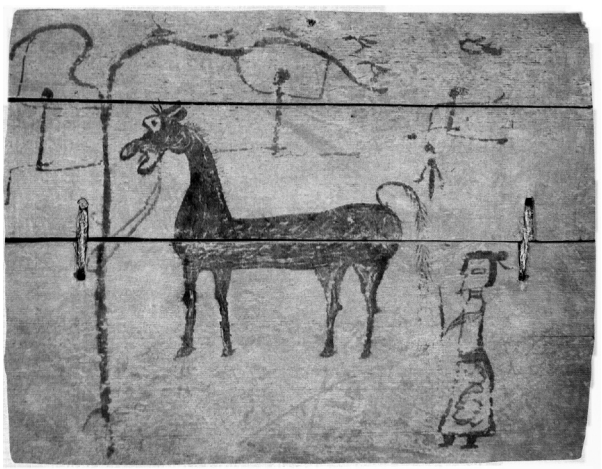


圖18　居延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木板畫
大阪府立近つ飛鳥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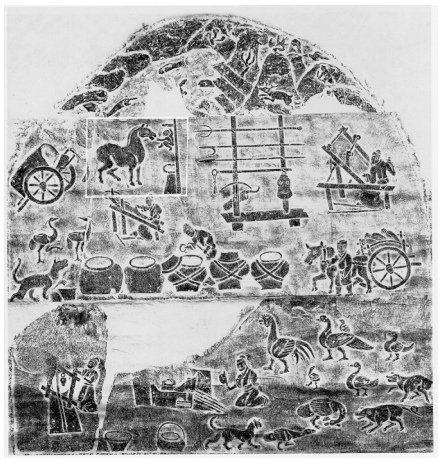


圖19　《中國畫像石全集》7 圖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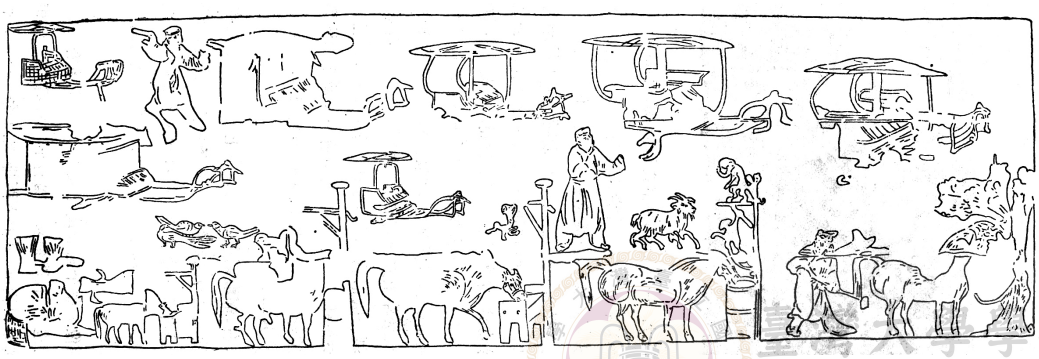


圖20　《密縣打虎亭漢墓》圖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1.1 A. Salmony 1933 pl. 35.9



圖21.2 E. Bunker 2002 p.146 no.122



圖21.3 《大黃河文明の流れ－山東省文物展》日本山口縣西武美術館



圖22.1-2 關野雄《半瓦當の研究》圖版2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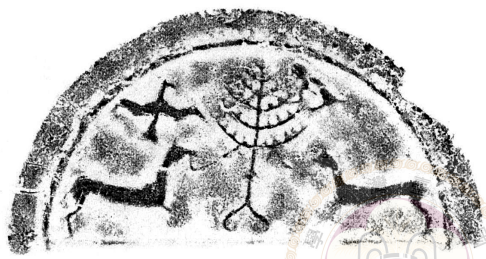


圖22.3 傅嘉儀《中國瓦當藝術》圖1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